

非洲联盟

Africa Union



2019 年广东省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决赛

**Finals of 2019 Guangd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Model United Nations**

非洲联盟

非洲联盟历史

“1963年5月25日，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当时获得独立的32个非洲国家同意建立非洲统一组织（OAU）。此后，有21个成员国相继加入，1999年9月9日，非洲统一组织第四届特别首脑会议通过《锡尔特宣言》，决定成立非洲联盟（非盟）。2002年7月，非盟正式取代非统，到2002年非盟成立时，总数达到53个。2011年7月9日，南苏丹成为非盟第五十四个成员。”最初，非统在其宪章中明确了其宗旨，这一宗旨也成为了后来的非洲联盟宪章的基础。根据宪章，非盟的目标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协调和加强合作和努力，为非洲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维护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消除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和分立主义；促进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合作；协调会员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福利、科学、技术和国防政策。”

议题 1：童婚

议题历史

直到20世纪，童婚——一方或双方未满18岁的结合，在文化和法律上都是被接受的。考虑到在平均预期寿命在40到45岁之间的时候，人们必须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尽快生育，童婚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尽管男孩和女孩都经历过童婚，但最普遍的组合是年轻女性和老年男性。在大多数社会中，女性一到青春期就嫁给了一个年长的男性，这样她们就可以马上开始生孩子了。然而，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国在制造业和科学领域的发展，大多数妇女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投票和工作的能力以及其他权利都显著增加。由于药医学条件的显著改善，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大大增长。随着这些进步，发达经济体的人们开始对童婚的道德性提出质疑，于是童婚在这些国家逐渐消失。然而，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尽管遭到全球的抗议和抵制，童婚仍在继续。那些支持童婚的人说，这是这些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这种做法普遍利用和压迫青年妇女，非洲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这种做法在本质上是有害的，应当予以限制，并最终予以彻底废除。

现状

每年，大约有1400万18岁以下的女孩嫁给比她们大得多的男性。这些婚姻大多是由女孩的父母安排的。目前，在非洲大陆，超过1亿妇女在还未满十八岁时就已经结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近40%的女孩在18岁之前结婚，约10%的女孩在15岁之前结婚。在尼日尔等一些国家，超过3/4的妇女在18岁之前结婚。贫困与童婚有很强的相关性，教育与童婚的相关性更大。然而，导致童婚的最大因素似乎是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别歧视。

贫穷与童婚之间存在着很强相关性。最贫困家庭的女孩在18岁之前结婚的可能性是最富裕家庭的女孩的三倍。不能肯定贫穷必然导致童婚，但是，有太多的因素表明贫穷就是导致童婚的真正原因。童婚的支持者们通常为其经济利益辩

护，他们通常认为贫穷是迫使父母将女孩早早嫁出的主要因素。在非洲的许多国家，存在着嫁妆交换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父母必须为他们未来的亲家支付大笔款项，才能嫁出自己的女儿，这种制度使得成年但尚未出嫁的女儿成为已经陷入困境的家庭的巨大经济负担。然而，这一负担可以通过利用对年轻新娘的高度需求来减轻。在许多国家，年轻的女性被年长的男性所珍视，因而许多家庭在将未成年的女儿嫁给一个年长男性时能够获得一笔钱。通过童婚，家庭不仅克服了支付嫁妆的负担，还能够减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在有童婚文化的国家，嫁出女孩的家庭通常不会指望孩子支持或回报原来的家庭，而被嫁出的女孩也通常没有能力支持或回报原来家庭。因此，对于投资在女孩身上的金钱，很多家庭基本不期待任何回报或者期待很少的回报。于是，这些家庭的通常做法就是将抚养孩子的重担转嫁给其未来的丈夫，当然这种转嫁早越好，亦即在女孩年龄越早时越好。

教育机会不足与童婚之间也有很强的相关性，然而，很难说两者中究竟是童婚造成了教育机会不足还是教育机会不足造成了童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4900万适龄女孩没有接受初等或中等教育。童婚和早孕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许多歧视性的政策的出台，合法的阻止怀孕和已婚女孩上学，然而，即使没有这些法律，也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压力，使已婚女孩上高中或大学面临巨大挑战。

一个来自坦桑尼亚的女孩17岁就怀孕了，她说：“老师发现我怀孕了。”“我发现，如果怀孕，没有人可以留在学校。…我没有关于怀孕(性教育)的任何知识，也不知道怀孕后会发生什么”缺乏性教育也对童婚的普遍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女孩们还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节育措施时，她们往往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并且由于文化压力被迫结婚。这是怀孕和童婚如何使女学生无法继续上学的一个例子。

当女孩无法上学并接受培训来为她们为自己的工作和养老做好准备时，她们被迫与老年人结婚，以保证经济的稳定。这个循环有另一个不幸的后果。由于年轻妇女被迫辍学，童婚的受害者没有受过教育，因此没有能力主张自己的权利。

非洲儿童婚姻的最大风险因素似乎是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别歧视。2013年，非洲联盟发起了一项旨在终止童婚的运动，详细阐述了以下主题：

“首先，在许多社区和国家，基于性别的暴力，特别是针对女童的暴力行为非常严重，即使在步行上学的情况下，青少年女孩也有遭受强奸的风险。例如，2009年在坦桑尼亚进行并于2011年出版的一项全国性暴力侵害儿童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女孩和七分之一的男孩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暴力。这些性侵犯大多发生在家庭或学校，或上学或放学的路上，而儿童往往认识对他们进行性侵的人。非洲许多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工作所搜集到的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并非坦桑尼亚独有。考虑到暴力侵害女童的普遍性，父母可能会让女儿结婚，相信这将有助于保护她免受性侵犯，这些性侵犯可能会使她们在社会上受到侮辱。自相矛盾的是，父母的这些想法往往是错的。18岁之前结婚的女孩比晚结婚的同龄人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包括婚内强奸。此外，儿童新娘经常表现出性虐待和创伤后压力的症状，如绝望、无助和严重抑郁。

第二，强调对女童的这些形式的暴力和虐待是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常常使女童被视为不值得关心和保护的。在父权制文化中，女孩从出生起就没有被赋予和男孩一样的价值；家庭和社区可能会低估教育和投资女儿发展的

好处。儿童新娘的是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的强烈反映。童婚对女童和社会有着毁灭性的影响。”

阵营立场

许多非洲国家已经采取措施，试图阻止和预防童婚。在许多非洲国家，这些政策具有争议性，因为它们将国际公认的道德规范与传统的部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对立起来。所有非洲国家政府的总体共识是，童婚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许多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限制这种做法。

尼日尔

童婚在尼日尔非常普遍，尼日尔是世界上头号童婚国家，国际婚姻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饥饿危机的结果，目前饥饿危机在整个西非干旱地区影响着数百万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负责人 **Djanabou Mahonde** 说：“可怕的是，如果粮食危机持续下去，更多的父母会将婚姻作为生存策略，我们会看到更多女孩在 15 岁之前结婚。”尼日尔不仅接受童婚，而且该国的大多数地区都期待童婚。超过四分之三的尼日尔女孩在 18 岁之前结婚，在该国的某些地区，这一比例几乎是 90%。并且不难看出在尼日尔教育与童婚之间的联系：约 80% 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和 63% 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在 18 岁之前结婚。中等以上学历的妇女中，童婚率仅为 17%。

尼日尔政府以法律明令禁止 15 岁以下的婚姻和所有为取得男女双方一致同意的婚姻，但这些法律显然未得到遵守或执行。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尼日尔家庭来说，婚姻意味着嫁妆，而嫁妆包括动物和现金，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往往意味着生存。

埃及

在埃及，人口理事会的伊什拉克计划为 12 至 15 岁的失学女孩提供识字和算术课程，以及健康和技能。该计划还提供金融教育和体育节目，并通过小组教育会议吸引社区成员，讨论儿童婚姻的后果和替代方案。在该项目本身的一份报告中，参加者对婚姻和生育标准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该计划承认，这不是最终目标。许多童婚都是非自愿的，因此必须改变的不仅仅是年轻女性的思想，而是整个社会的观念。

塞内加尔

在塞内加尔的农村地区，托斯坦的社区授权计划使妇女和青少年能够接受当地语言的非正式教育。通过为期三年的关于民主、人权和健康的综合课程，妇女和女孩学会将人权应用到自己的文化背景中，并挑战诸如童婚等有害的传统做法。它还动员村领导和社区成员放弃童婚，鼓励亲友放弃童婚做法。

在 25 年的实践中，该计划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这些成功包括：公开谴责童婚，增加女性领导能力，增加女孩入学率。该计划适用于村庄的每个成员，包括青少年和成年人，男性和女性。

问题思考：

如何才能结束强迫童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如何需要考虑如何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如何优先考虑年轻女孩的教育和赋权，而不是仅仅把她们视为“交易”？“教育是通向成功的重要途径，往往比金钱或物质资源更强大。对于年轻女孩来说，要获得成功并避免强迫结婚，确保她们掌握生活技能并获得教育机会是至关重要的。

如何消除童婚的系统性根源？贫困和饥饿等因素导致强迫童婚的流行。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缓解这些因素？

如何打破/改变现有的文化规范，同时尊重国家、民族和部落的自治权和主权，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强迫童婚如此普遍的一个最大原因是，这种做法以及对妇女的暴力和歧视都是可以接受的。应该怎样改变家庭和农村的领导者的观念，让他们支持对青年和妇女赋权？

议题 2：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难民

议题历史

过去十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历了各种动荡，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难民危机之一。内战一直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和布隆迪。一般的政治紧张局势也给厄立特里亚和尼日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该地区一些冲突的历史进行回顾审查，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当前形势的复杂性。

南苏丹

2013 年，独立两年后的苏丹南部爆发了内战，总统萨尔瓦基尔指责里克马沙尔企图发动政变。

因此，主要由丁卡族人组成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与主要由努尔族人组成的苏丹反对派人民解放运动（SPLM-IO）之间爆发了战争。民族分界线沿线的平民成为了被袭击的目标，强奸、性暴力和破坏财产和村庄的罪行不断发生。联合国安理会在 2013 年底部署了安全部队和维和人员，以协助国家建设工作，然而，冲突自那以后已经升级。2017 年 2 月，政府和联合国宣布该国发生饥荒，这意味着了该国农业地区遭到破坏，迫使人们逃离家乡。由于频繁的暴力和粮食危机的威胁，平民不断在逃离本国进入周边国家。到 2017 年底，冲突已经造成近 200 万难民，这些难民流落到乌干达、苏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国并在这些国家定居。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动乱是第二次刚果战争的遗留问题，该战争于 2003 年正式结束，刚果民主共和国过渡政府接管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东部的基伍省，胡图族针对卢旺达支持的图西族的暴力活动仍然存在，在图里，伦杜和赫马之间的种族冲突仍在继续，在加丹加省，叛乱反叛组织仍然活跃。

尽管数千名联合国维和人员进驻该国，然而其东部地区仍活跃着数十个武装团体。此外，在总统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试图实行独裁统治的情况下，政治不稳定导致了大规模抗议和警察与平民之间的冲突。截至 2017 年 12 月，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因持续的暴力活动而有 450 万人流离失所，50 万刚果难民重新安置到乌干达、坦桑尼亚、布隆迪、赞比亚和马拉维。

布隆迪

2015 年，布隆迪时任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宣布他将在当年的选举中竞选第三届总统，持续多年的骚乱随机升级。政府以关闭互联网、电话网络和大学来回应示威和抗议。联合国报告称，在 2015 年暴力事件的前几个月，有 11.2 万难民逃到了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坦桑尼亚。后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授权部署 5000 名维和人员，但这些维和人员受到了恩库伦齐扎的

Finals of 2019 Guangd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Model United Nations

威胁，并最终解散。尽管这次大规模的暴力没有升级，但到 2017 年 2 月，该国的动荡已经使近 40 万难民居无定所。

尼日利亚

在尼日利亚，叛乱组织一直是引起动乱的罪魁祸首。其中最著名的是博科圣地，这是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对当地警察、军队、宗教和政治团体以及平民进行恐怖袭击。包括高度腐败和石油分布不均等在在内的经济和政治挑战阻碍了政府成功开展针对博科圣地的平叛的能力。在该国北部，自 2013 年以来，反叛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叛乱组织针对平民的攻击行为。如在奇博克绑架 276 名女学生和其他绑架事件都是该国在其北部进行平叛的目标。超过 230 万人在国内以及尼日尔、乍得和喀麦隆流离失所。

厄立特里亚

这个非洲小国是由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领导的独裁国家，萨亚斯·阿费沃基执政 26 年，国内没有立法机关，独立司法机构、民间社会组织或媒体组织。这种压迫性的统治导致大约 12% 的人口逃离。对言论，表达和结社自由的强制镇压使公民受到密切监视，丧失权利。据联合国报道，厄立特里亚人生活在被任意拘留的“恐惧统治”之下，这些任意拘留的行动往往导致政府犯下罪行。此外，征兵是强制性的，并且兵役通常持续超过规定的 18 个月，并且据报道在某些情况下延长了数十年。截至 2016 年，将近 25 万难民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定居，33,000 难民名在以色列定居，截止 2015 年，在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定居的人数不详。

当前局势

截至 2017 年，难民人数最多的仍然是非洲，由于冲突或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有 2000 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截至 2018 年，乍得，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正在收容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半以上的难民，占全世界难民的 12%。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布隆迪和其他存在暴力和政治不稳定的国家政局的动荡使得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保护极为困难。由区域不稳定引发并不断恶化的问题包括粮食安全，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和教育问题。联合国难民署仍然是为解决无国籍和难民融入接收国等议题而进行立法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对难民营的袭击，继续以暴力循环方式打击人道主义组织，进一步加重了救济工作的负担。例如，在中非共和国一个天主教团有 40 多人被杀。此外，近年来，向欧盟的移民成为了欧盟各国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向欧盟的移民目前处于危机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非洲接收这些移民和难民的国家的状况更加严重和极端。因此，在考虑帮助产生难民的国家，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评估对接收这些难民或者移民的国家的社会压力以及如何实施政策以帮助接收国接纳难民融入社会。

粮食安全问题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饥荒预警系统网络于 2017 年宣布，并在 2018 年重申了南苏丹，索马里，尼日利亚和也门等国家的饥荒和农业恶化预警。社会和政治因素及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高度影响共同给人道主义带来了新的挑战。尼日利亚边境的尼日尔迪法尔地区接收了 30 多万逃离博科圣地和其他地区的难民。在 2018 年 11 月下旬，洪水摧毁了该地区近 400 公顷的大米，大米损失大共约 113 万美元。此外，尼日利亚一个生产该国主要农作物并被称为“食品摇篮”的中部地带，一直受到宗教和农牧民冲突的影响，这些冲突已经使数千人流离失所，并对该地区的饥荒负有很大责任。此外，在南苏丹，因为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反对势力的遣散复员，而不是发展，大约 60% 的人口经历过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像 Pajok 这样一个曾经繁荣的农业城镇，已经陷入了低产状态。

在喀麦隆，对城镇的掠夺、居民大批逃离乌干达地区使得农田遗弃，造成了粮食危机。喀麦隆接收了成千上万的因为暴力而逃离尼日利亚的难民，再加之与博科圣地发生冲突，政府政策以及如乍得湖萎缩等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农作物生产十分困难，同样也经历了粮食短缺。

国际社会如何应对粮食安全问题，以有效减轻其蔓延，在冲突地区创造生产力，并为接收国提供援助呢？

教育

联合国难民署的一项名为《扭转浪潮：危机中的难民教育》研究报告估计，2017 年全球有 400 万学龄儿童失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移民和流离失所者的 2019 年全球教育监测 (GEM) 报告》则深入了解了本地区的教育工作。难民或者移民在到达接收国时，其教育水平远低于同龄人。乍得冲突地区 6-14 岁难民中，30% 是文盲。由于资源紧张，难民的涌入降低了东道国的教育质量。在达达阿布的一个肯尼亚难民营，学龄前儿童的师生比例达到 120:1，小学生的师生比例达到 56:1，只有 8% 的小学教师是合格的。接收国与联合国难民署已经为改善难民儿童的教育做出了许多努力了。2017 年 8 月，吉布提教育和职业培训部签署了一项法案，允许难民儿童获得与吉布提儿童同等质量的教育。乌干达是难民最多的国家，但 57% 的难民儿童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2018 年 9 月，乌干达政府宣布了一项计划，即与联合国和发展机构共同制定的教育应对计划，旨在提高乌干达 12 个难民托管区所有形式教育的入学率和学习质量。这项计划包括修复旧教室和建造新教室，向学生提供教科书、课桌和文具，解决教师短缺，并让老年人参与到该计划中。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向难民提供庇护，并赋予其与本国公民同样的权利。乌干达政府认识到国际社会帮助实现这一计划的必要性。联合国难民署保护事务高级助理委员会沃克·特克总结了形势的紧迫性，指出“教育投资也可以为接收国社区提供真正的机会”。

如何制定一个框架，将受教育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与难民融合起来转化为接收国的劳动力？非洲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在向难民提供教育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

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Finals of 2019 Guangd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Model United Nations

针对妇女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武装分子、叛乱分子和极端分子为了巩固各自在所在国家的权力而采用的一种常见而残酷的意识形态战略和恐怖战略。武装组织利用暴力作为破坏社区和恐吓反对派以及削弱政府的手段。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 22.3% 的妇女被报道过遭到身体暴力。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恐怖组织强奸了数百名妇女和女孩，并且这种行动构成了该组织控制该国农村地区的战略的一部分。根据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2013 年至 2017 年，中非共和国的武装组织将强奸和性奴役作为一种战争策略，报告披露了 305 起强奸和性奴役案件（这一数据极有可能被低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7 年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在通过北非进入欧洲的移民路线上，“难民和移民儿童和妇女经常遭受性暴力、剥削、虐待和拘留。为了减少对年轻女孩的暴力事件的发生，国际社会制定了许多计划。例如，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实施了一项为期一年的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难民的项目，此项目名为 COMPASS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hrough Mentoring,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afe Spaces)，结果表明，这一项目促进了未成年女性向成年女性的健康过渡。每周一次的课堂教学旨在培养女孩对暴力危险因素的了解，重塑性别角色的观念，旨在使她们有能力主张自己的权利和保护身体安全。虽然该计划主要是针对对暴力的干预措施，但它提高了女孩对受教育权和晚婚权的理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6 年的《非洲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性别不平等正在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每年损失 950 亿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妇女和女童已经构成了人口中一个脆弱的环节，而这一状况正在被人口迁移加剧。作为可以帮助他们的原籍国和接收国从这场危机中恢复的宝贵社会成员，他们仍然被系统地忽视了。国际社会以何种方式进行干预，以保护妇女和女童免受这种操纵和系统性歧视？

问题思考

非洲联盟如何为撒哈拉以南的众多难民危机制定解决方案，而不对可能导致这些危机的任何区域间/政治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

不一定受这些危机影响的国家如何平等参与寻求解决方案？

如何让教育需求与粮食、水和住房等基本人道主义需求同时被解决？换言之，我们如何确保在解决这些议题时教育占据同样重要的位置？

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机构如何参与解决这些问题？哪些组织可以参与？

针对这些问题，你能提出什么永久性的解决方案？通常在难民危机中，一些国家会捐赠大量资金，并建造临时避难所和诊所来缓解危机。你能提出什么永久性的解决方案，而非临时性的解决方案？